

由《河岳英灵集》看殷璠对陶渊明的接受

卢燕新

(南开大学 文学院,天津 300071)

摘要:唐人选唐诗自刘孝孙《古今类序诗苑》始,至殷璠《河岳英灵集》,选评内容及于陶渊明者,唯《续诗苑英华》等一二种而已。虽然,《河岳英灵集》品评诗人未及陶渊明,但是,该集选录田园诗、评品田园诗句、选王维《偶然作》其四与崔颢《结定襄狱效陶体》,据此等可见殷璠对陶渊明的接受,亦可管窥陶渊明对唐人的影响。研究此等,不仅可探究殷璠的诗学主张,厘清陶渊明对唐代文士与唐代文学的影响,亦可管窥唐文士与唐选诗理论家接受陶渊明的历程、探赜其发展变化规律。

关键词:《河岳英灵集》;选评诗人诗什;殷璠;陶渊明;接受

中图分类号:I206.422

文献标识码:A

文章编号:1000-2359(2013)05-0126-05

作者简介:卢燕新(1967—),男,陕西柞水人,南开大学文学院副教授,文学博士,主要从事古籍整理、唐宋文学研究。

一、从《古今类序诗苑》到《河岳英灵集》——殷璠以前唐诗选本对陶渊明的接受

唐人编纂的诗歌选本,以其选录内容,可分为两类:一类专选唐人诗什,一类兼选唐人与唐前诗什。前者可谓之断代选诗总集,即狭义的唐人选唐诗。后者可谓之通代选诗总集,即广义的唐人选唐诗^[1]。理论上讲,唐人编纂的通代选诗总集,以其兼选前唐诗什,陶诗或有在选可能。故本文首先拟探讨《河岳英灵集》以前的唐诗选本、尤其是通代诗歌总集,看看起于初唐迄于殷璠,唐选诗理论家对待陶渊明的态度若何。

唐人编纂较早的通代诗歌总集乃《古今类序诗苑》三十卷,刘孝孙集撰,《旧唐书》卷四七《经籍志》下丁部集录著录。《旧唐书》卷七二《褚亮传》附录、《续通志》卷二一〇《褚亮传》后所附刘孝孙事迹中亦载录该集,卷目稍异。诸典籍著录集名同为《古今类序诗苑》。《新唐书》卷六〇《艺文志》四丁部总集类,《通志》卷七〇《艺文略》八诗总集类,《玉海》卷五四“唐七十五家总集总论”条、卷五九《梁古今诗苑英华》条等,所载该集编撰者、卷数皆与《旧唐书·经籍志》同,然集名为《古今类聚诗苑》。据集名,该集兼选唐人及唐前诗歌,以类结集。刘孝孙,《旧唐书》卷七二《褚亮传》后附其事迹:“刘孝孙者,荆州人也

……尝采历代文集为王撰《古今类序诗苑》四十卷,十五年,迁本府谏议参军,寻迁太子洗马,未拜卒。”《新唐书》卷一〇二《褚亮传》后附其事迹与《旧唐书》略同,故该集至晚当编于贞观十五年以前。傅璇琮先生主编《唐五代文学编年史》考该集编于贞观十年,可参考。集已佚。

《古今类序诗苑》后,有慧净《续诗苑英华》。该集旨在续昭明太子等《诗苑英华》。《诗苑英华》约在梁天监年间(502—519)编成,因此,慧净选诗,时间上应当是起梁迄唐,故陶渊明不在遴选范围之内。然,刘孝孙《续诗苑英华序》云:“若乃《园柳》、《天榆》之篇,《阿阁》、《绮窗》之咏。魏王《北上》,陈思《南国》,嗣宗之赋《明月》,彭泽之摘《微雨》,逮乎颜、谢摘藻,任、沈遁文,足以理会‘八音’,言谐‘四始’。”“《微雨》”,检今存陶渊明集,《读山海经》其一云:“微雨从东来,好风与之俱。”《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》:“微雨洗高林,清飙矫云翻。”刘孝孙序言是否指代这两首诗,已难详考。但,据这段序文可见,《续诗苑英华》评品魏晋诗人诗文有三点值得注意:第一,慧净“商榷翰林”、历数魏晋诗人诗文,陶渊明在品评之列。第二,慧净将陶渊明与曹操、曹植、阮籍、颜延之、谢灵运、沈约、任昉等并举。第三,在评品代表作品与成就时,慧净云“彭泽之摘《微雨》”,

以之和“魏王《北上》”、“陈思《南国》”并行。另,据序文“咸递相祖述,郁为龟镜,岂独光于曩代而无继轨者乎”,可见慧净是以史学眼光看待其所论述诗人的。因此,在慧净诗学评价体系中,陶渊明及其诗文还是有一定地位的。

《续诗苑英华》之后,有佚名《诗编》十卷,《大唐新语》卷九“著述”条载:“贞观中,纪国寺僧慧净撰《续英华诗苑》十卷,行于代。并录慧净自言曰:‘作之非难,鉴之为贵,吾所搜拣,亦诗三百篇之次矣。’慧净,俗姓房,有藻识,今复有《诗编》十卷,与《英华》相似,起自梁代,迄于今朝,以类相从,多于慧净所集,而不题撰集人名氏。”又,李康成集撰《玉台后集》十卷,《郡斋读书志》卷二“《玉台新咏》”条释曰:“李康成云:‘昔陵在梁世,父子俱事东朝,特见优遇。时承华好文,雅尚宫体,故采西汉以来词人所著乐府艳诗,以备讽览。’”其“《玉台后集》”条亦曰:“唐李康成采梁萧子范迄唐张赴二百九人所著乐府歌诗六百七十首,以续陵编。序谓:‘名登前集者,今并不录,惟庾信、徐陵仕周、陈,即为异代,理不可遗。’”又,李吉甫集撰《丽则集》五卷,《通志》卷七〇《艺文略》八诗总集类注曰:“自梁至唐开元间歌诗。”晁氏《郡斋读书志》“《丽则集》”条考释:“唐李氏撰,不著名,集《文选》以后至唐开元间词人诗凡三百二十首,分门编类,贞元中,郑余庆为序。”《玉海》卷五四所载略同。故这几部总集这四部总集选录诗章起始于梁,陶渊明诗什亦不在遴选之列。因文献不足证,其诗论是否言及陶渊明,未详。

又,郭瑜集《古今诗类聚》七十九卷,《旧唐书》卷四七《经籍志》下集录总集类,《新唐书》卷六〇《艺文志》四丁部总集类,《玉海》卷五四“唐七十五家总集”条、卷五九“梁《古今诗苑英华》”条皆著录是集,题郭瑜撰。《通志》卷七〇《艺文略》八诗总集类著录为《古今诗类》。该集的特点,由集名推测,乃以类集诗,兼选唐人及唐前诗文。因此,据前文,《古今诗类聚》略同《古今类序诗苑》,均有可能选录陶渊明诗什。但这两种总集逸佚,详莫能知。

又,(疑)郭瑜编《歌录集》八卷,《旧唐书》卷四七《经籍志》四集录总集类,《新唐书》卷六〇《艺文志》四丁部总集类,《通志》卷七〇诗总集类皆著录。僧玄鉴编撰《续古今诗集》三卷,吴兢集撰《古乐府》十卷,《郡斋读书志》卷二《乐》类著录,其考释云:“唐吴兢纂。杂采汉、魏以来古乐府辞,凡十卷。”又,佚名有《乐府集》十卷。这几部总集,文献不足证,其是否选录陶渊明诗什,存疑。

《河岳英灵集》以前,唐人编诗句选本数种,其原集均佚。据相关资料,今人仍可管窥其对前唐诗人的接受状况,现附论于此。其较早者,乃褚亮等《古

文章巧言语》一卷。褚亮,《旧唐书》卷七二本传云:“太宗幸辽东,亮子遂良为黄门侍郎,诏遂良谓亮曰……亮奉表陈谢。及寝疾,诏遣医药救疗,中使候问不绝。卒时年八十八。”《新唐书》卷一〇二本传略同。唐宗幸辽东事在贞观十九年(645),贞观二十年初(646)班师回京。又,《旧唐书》卷八〇《褚遂良传》载:“二十一年,以本官检校大理卿,寻丁父忧解。”故褚亮卒于贞观二十一年(647),《古文章巧言语》至晚当于本年前编成。傅璇琮主编《唐五代文学编年史》谓该集大约编于贞观十五年前后,可参考。《古今诗人秀句》,元兢编撰。日本人遍照金刚《文镜秘府论》南卷《集论》著录元兢《古今诗人秀句序》论及《古文章巧言语》《古今诗人秀句》^[2],诗论所及者有王融、王粲、潘岳、徐干、谢朓等,未有一字言及到陶渊明,集中选录陶氏诗句之可能性亦不大。又,吴兢、僧元鉴集撰《续古今诗人秀句》二卷,以其集名观之,陶诗亦不会在选。

又,许敬宗等集撰《瑶山玉彩》五百卷,《新唐书》卷八六《孝敬皇帝弘传》谓“即文思殿摘采古今文章号《瑶山玉彩》”,《旧唐书》卷八二《许敬宗传》等略同。《玉海》卷五四云:“龙朔元年,命宾客许敬宗……即文思殿采摘古今文章英词丽句,以类相从,号《瑶山玉彩》。”傅璇琮等《〈河岳英灵集〉研究》认为:“采摘古今诗文中的‘英词例句’,乃是当时的风气。”^[3]据此知《瑶山玉彩》乃诗句选集,以其选录的时间范围观之,其或选陶渊明诗句。

因此,《河岳英灵集》以前,今所见者,维刘孝孙《续诗苑英华序》品评诗人言及陶渊明,然《续诗苑英华》未选陶渊明诗什。其他,佚名《诗编》、李康成《玉台后集》、李吉甫《丽则集》等,均未选陶渊明诗。刘孝孙《古今类序诗苑》、郭瑜《古今诗类聚》,疑其选录陶渊明诗。其他,《歌录集》《续古今诗集》《古乐府》《乐府集》等,因原集佚逸,其是否选录陶渊明诗,尚难定论。诗句选方面,《古文章巧言语》《古今诗人秀句》,疑其未选陶诗,《续古今诗人秀句》等未及陶诗。许敬宗等编《瑶山玉彩》,据《旧唐书》本传所谓“摘采古今文章”,疑其采选陶诗章句,然难以确考。

二、《河岳英灵集》评品诗人特点及其对前唐文士的接受

《河岳英灵集》专选唐人诗什,表面上看,和前唐文士并无关系。然,殷璠除选诗外,凡选录诗人后皆有诗评,诗评内容包括叙说诗人生平、评价诗人创作特点、评介诗人诗风等。从评价方式看,《河岳英灵集》品评的显著特点是援引前唐文士评品唐人。具体分析,其特点有三:

第一,选取唐前文士,以之比较所遴选诗人的生平际遇及其文学成就。如评常建云:“高才无贵士,

诚哉是言。曩刘桢死于文学，左思终于记室，鲍照卒于参军，今常建亦沦于一尉。”评价孟浩然云：“余尝谓祢衡不遇，赵壹无禄，其过在人也。及观襄阳孟浩然罄折谦退，才名日高，天下籍甚，竟沦落明代，终于布衣，悲夫！”这里，殷璠引刘桢、左思、鲍照与常建对比，以祢衡、赵壹与孟浩然对比，可谓良苦用心。前者属正比，殷璠刘、左、鲍三人，旨在点名“高才无贵士”。以祢、赵与孟浩然比则不同，其属于反比，旨在点名孟浩然“罄折谦退，才名日高”，却“沦落明代”这一奇怪历史现象，为常、孟鸣不平，从而达到赞誉常、孟文学成就之目的，进而引起人们对常、孟命运的关注与思考。这里，殷璠通过选择对象有两个特点：一是选取前唐文士，评价唐代诗人时，亦对前唐文士作了相应的评品。二是援引前唐文士，其主要时间范围集中在魏晋南北朝一段。可见，殷璠魏晋南北朝文学颇为关注。

第二，选取唐前文士或文学现象，评价所遴选诗人诗风。如评价李白云：“白性嗜酒……至如《蜀道难》等篇，可谓奇之又奇，然自骚人以还，鲜有此体调也。”评价崔颢云：“至如‘杀人辽水上，走马渔阳归。错落金锁甲，蒙茸貂鼠衣’，又‘春风吹浅草，猎骑何翩翩。插羽两相顾，鸣弓上新弦’，可与鲍照、江淹并驱也。”评价刘昫云：“昫虚诗……自永明已还，可杰立江表。”评价王湾云：“湾词翰早著……又《捣衣篇》云：‘月华照夜空随妾，风响传砧不到君。’所有众制，咸类若斯。非张蔡之未曾见也，觉颜谢之弥远乎。”评价张辅国云：“国辅诗婉变清楚，深宜讽味，乐府数章，古人不及也。”评价王维，《唐诗纪事》卷一六王维条下、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均有：“诂肯惭于古人也。”莫友芝临毛校，认为：“七字又不似殷氏语”，今以殷璠溯源是品评方式观之，其云“诂肯惭于古人也”可能性甚大。评陶翰云：“历代词人，诗笔双美者鲜矣。今陶生实谓兼之，既多兴象，复备风骨，三百年以前，方可论其体裁也。”据所引诸条，殷璠评论诗人诗风时，其有两方面特点：一是引用文史现象评品。二是选择唐前文士、援引特指称谓，与所遴选对象比较评品。

第三，评价唐前诗风，论述其影响。如评王昌龄云：“元嘉以还，四百年内，曹、刘、陆、谢，风骨顿尽。顷有太原王昌龄、鲁国储光羲，颇从厥迹。且两贤气同体别，而王稍声峻。”“元嘉”，据“四百年内”，当指汉桓帝年号（151—152），曹，曹操；刘，刘桢；陆，陆机；谢，谢灵运。由此可见，殷璠论诗，颇为注重文学史衍变过程。

上列材料中，《河岳英灵集》评王湾时云“颜谢”，这一点颇值得研究。“颜谢”，南朝宋诗人颜延之与谢灵运的并称，事见《宋书·颜延之传》：“延之与陈

郡谢灵运俱以词彩齐名，自潘岳、陆机之后，文士莫及也，江左称颜谢焉。”唐人颇喜并称“颜谢”以论诗人诗什。如杨炯《盈川集》卷三《王勃集序》云：“潘陆奋发，孙许相因。继之以颜谢，申之以江鲍。”卢照邻《卢升之集》卷六《乐府杂诗序》：“潘陆颜谢，蹈迷津而不归。”张说《张燕公集》卷二一《齐黄门侍郎卢思道碑》：“宋齐有颜谢江鲍。”宋黄氏父子《补注杜诗》之《传序碑铭》录元稹《唐杜工部墓志铭》云：“掩颜谢之孤高。”注曰：“颜延年谢灵运。”《旧唐书》卷一九〇下《杜甫传》载：“至于子美，盖所谓上薄《风》、《骚》，下该沈、宋，言夺苏、李，气吞曹、刘，掩颜、谢之孤高，杂徐、庾之流丽，尽得古今之体势，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！”可见，唐人论诗，“颜谢”并称甚为常见。殷璠援引这一诗学称谓，其接受观与初盛唐盛行的诗学主张合。

然，唐人亦以“陶谢”并称。“陶谢”指代主要有两说，一曰陶渊明、谢朓；二曰陶渊明、谢灵运。唐宋论诗者多指后者。如宋郭知达编《九家集注杜诗》卷二六杜甫《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》云：“焉得诗如陶谢手，令渠述作与同游。”注云：“陶渊明、谢灵运。”宋王质撰《绍陶录》卷上《书陶元亮谱》：“元亮高风，发于宋晋去就之际……陶谢皆世臣，君世地色言俱辟，而灵运为武帝兼任。”宋苏轼《东坡全集》卷九三《书黄子思诗集后》：“苏李之天成，曹刘之自得，陶谢之超然，盖亦至矣。而李太白、杜子美以英玮绝世之姿，凌跨百代。”郭绍虞《中国历代文论选》注云：“陶、谢，陶渊明、谢灵运。”^[4]类似者甚多，现再举数例。如白居易《白氏长庆集》卷一一《哭王质夫》：“篇咏陶谢辈，风衿嵇阮徒。”李群玉《李群玉诗集》卷上《赠方处士兼以写怀》：“喜于风骚地，忽见陶谢手。”宋范晞文撰《对床夜语》卷二：“陶谢至盛唐诸公，透彻之悟也。”宋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題》卷一九录《柳宗元诗》云：“子厚诗在唐与王摩诘、韦应物相上下，颇有陶谢风气。”明胡震亨撰《唐音癸签》卷六：“子美多释语、累语，置之陶谢间，便觉面目有异。”明陆时雍《古诗镜·诗镜总论》云：“世以李杜为大家，王维高岑为傍户，殆非也。摩诘写色清微。已望陶谢之藩矣。”清王琦《李太白集注》卷三四云：“唐诸诗人高者学陶谢，下者学徐庾。”清赵殿成《王右丞集笺注》之《附录三条·诗评》云：“维诗清逸，追逼陶谢。”又，据《九家集注杜诗》卷二录杜甫《夜听许十一诵诗爱而有作》云：“陶谢不枝梧，风骚共推激。”《九家集注杜诗》、《补注杜诗》等均系本诗作于天宝十四载，这正好和殷璠编纂《河岳英灵集》迄止时间相近。可见，至晚在天宝间，唐人就开始自觉探寻陶渊明、谢灵运创作对唐人诗风影响。然，《河岳英灵集》援引“颜谢”而未及“陶谢”。

探析《河岳英灵集》援引前唐诗人品评唐人,还有以下几点值得关注:从对象特点及其出现频率看,殷璠援引鲍照、刘桢、谢灵运各为两次,余者各为一次。可见,殷璠对鲍、刘、谢的关注程度。从时间范围看,殷璠援引对象主要在东汉与魏晋南北朝这一历史阶段。从援引对象的创作体裁特点看,张衡、蔡邕、祢衡以赋文为主,余者以诗为主。从援引对象创作的内容倾向性看,有感慨时事者,有描写山水风光者,有述写个人际遇者等等。从援引对象创作的风格看,有豪放雄浑者、有壮丽奇俊者、亦有迤迳纤柔者等等。由此可见,无论是时间范围,还是内容、风格特点,陶渊明均当在援引之列。然,殷璠品评诗人,竟无一字言及陶渊明。

三、《河岳英灵集》选录诗什与殷璠对陶渊明的接受

《河岳英灵集》评品诗人未及陶渊明,这能不能证明殷璠接受观与陶渊明毫无关系?

先看具体诗篇。《河岳英灵集》选孟浩然、王维等,诸诗人均以田园诗成就享誉文学史。全集录存田园诗什,据不完全统计,有常建《春词》其一,王维《赠刘蓝田》《入山寄城中故人》,王季友《山中赠十四秘书山兄》,薛据《登秦望山》《出青门往南山下别业》,綦毋潜《春泛若耶》,孟浩然《夜归鹿门歌》,崔国辅《石头滩作》,储光羲《射雉词》《采莲词》《牧童词》《田家事》,祖咏《游苏氏别业》《清明宴刘司勋刘郎中别业》,卢象《家叔微君东溪草堂》二首,李崱《林园秋夜作》,阎防《晚秋石门作》《西次鹿门山作》《百丈溪新理茆次读书》《与永乐诸公泛黄河作》等二十余首,约占全集选诗总数的十分之一。

除选诗以外,《河岳英灵集》品评诗人时,往往录存大量诗句。其中,部分诗句颇有田园山水特色。仅以全集选评诗句总量计,这些诗句所占比例亦不低于十分之一。

(明)陆时雍《诗镜总论》云:“摩诘写色清微,已望陶谢之藩矣。”(清)翁方纲《石州诗话》卷二云:“储得陶之质。”(清)沈德潜《说诗碎语》卷上亦云:“陶诗胸次浩然,其中有一段渊深朴茂不可到处。唐人祖述者,王右丞有其清腴,孟山人有其闲远,储太祝有其朴实……皆学焉而得其性之所近。”故以诗风而论,殷选王维、孟浩然、储光羲、祖咏、卢象、綦毋潜等,此数人均和陶渊明有千丝万缕的关系。故由《河岳英灵集》选录诗章及选评诗句观之,殷璠审美观中,其对陶渊明以还的山水田园诗及其成就是肯定认同并积极接受的。

再仔细研阅殷璠选诗。《河岳英灵集》所选者有两首颇值得探赜:一是王维《偶然作》,一是崔颢《结定襄狱效陶体》。先看王维诗。《偶然作》组诗共五

首^[5]。这五首诗在艺术上没有什么大的差别,其区别就在于抒写内容各不相同。第一首咏“楚狂接舆”,第二首咏“田舍翁”,第三首感慨家世与生平艰难,第五首咏“箜篌女”、“儒生”。殷璠所选者第四首,其内容主要是颂赞陶渊明,包括歌咏陶渊明“任天真”的个性、“耽酒”与“爱菊”的嗜好、“奋衣野田”的追求、“生事不曾问”的生活态度等。《河岳英灵集》选录王维此诗,很明显,表明殷璠对陶渊明人格品行的赞赏。

陶渊明人品与文品,向得文士赞誉。明张溥《汉魏六朝百三家集》卷八一录昭明太子萧统《陶靖节集序》云:“是以圣人韬光,贤人遁世。其故何也?含德之至,莫逾於道;亲己之切,无重於身。故道存而身安,道亡而身害。……有疑陶渊明诗篇篇有酒,吾观其意不在酒,亦寄酒为迹者也。其文章不群,辞彩精拔,跌宕昭彰,独超众类,抑扬爽朗,莫之与京。横素波而傍流,干青云而直上。语时事则指而可想,论怀抱则旷而且真。加以贞志不休安,道苦节不以躬耕。为耻不以无财,为病自非大贤,笃志与道污隆,孰能如此乎?”唐王绩《东皋子集》卷中《晚年叙志示翟处士》云:“庚桑逢处跪,陶潜见吏羞。”同著同卷《赠学仙者》云:“谁知彭泽意,更觅步兵那。”王勃《王子安集》卷八《上明员外启》云:“三冬文史,先兆迹于青衿;百里弦歌,即驰芳于墨绶。彭泽陶潜之菊,胜气仍存;河阳潘岳之花,芳风遂远。”王勃《王子安集》卷一五《梓州郪县兜率寺浮图碑》云:“陶潜彭泽,自得高人。”杨炯《盈川集》卷一《卧读书架赋》云:“尔其临窗有风,闭户多雪。自得陶潜之兴,仍秉袁安之节。”李白《李太白文集》卷八《口号赠阳征君》云:“陶令辞彭泽,梁鸿入会稽。我寻高士传,君与古人齐。”清赵殿成《王右丞集笺注》卷一八王维《与魏居士书》:“近有陶潜,不肯把板屈腰见督邮,解印绶弃官去。”可见,殷璠推崇王维咏陶诗,实际上是唐人陶渊明接受观的体现。

再看崔颢诗。《结定襄狱效陶体》,芮挺章《国秀集》卷中亦著录。《国秀集》编成于天宝四年,略早于《河岳英灵集》。该诗题一作“定襄郡狱”或“结定襄郡狱”,上海古籍出版社《唐人选唐诗》(十种)、傅璇琮编《唐人选唐诗新编》著录《国秀集》选崔颢该诗,诗题均作“结定襄狱效陶体”。因此,至少可以肯定,崔颢诗与“效陶”必有某种联系。

唐文士有效陶习尚。如王绩《东皋子集》卷上《游北山赋序》云:“酒瓮多于步兵,黍田广于彭泽。”卷中《赠学仙者》云:“谁知彭泽意,更觅步兵那。”同卷《薛记室收过庄见寻率题古意以赠》:“尝爱陶渊明,酌醴焚枯鱼。尝学公孙弘,策杖牧群猪。”王勃《王子安集》卷三《三月曲水宴》云:“彭泽官初去,河

阳赋始传。田园归旧国,诗酒间长筵。”卷六《宇文德阳宅秋夜山亭宴序》云:“或三秋意契,辟林院而开襟;或一面新交,叙风云而倒屣。彭泽陶潜之菊,影泛仙樽;河阳潘岳之花,光悬妙理。”杨炯《盈川集》卷七《原州百泉县令李君神道碑》云:“南华吾师也……然后武城弦唱,优游礼乐之中;彭泽琴樽,散诞羲皇之表。虽杜当阳之文武,兰菊犹存。”同卷《益州温江县令任君神道碑》云:“是以德成者上,道在斯尊,陶潜则安枕北窗,言偃则鸣弦东武。”卢照邻《卢升之集》卷六《杨明府过访诗序》云:“岂使临邛樽酒,歌赋无声;彭泽琴书,田园寝咏。”李白《李太白文集》卷一七《陪族叔当涂宰游化城寺升公清风亭》云:“虽游道林室,亦举陶潜杯。”卷二二《题东溪公幽居》云:“宅近青山同谢朓,门垂碧柳似陶潜。”王维《王右丞集笺注》卷一九《送郑五赴任新都序》云:“杜陵解印,时卖故侯之瓜;鼓泽无官,诎有公田之黍。牵衣肘见,步雪履穿。”殷璠以前或同时,类似实例很多,此不一一。因此,据殷璠《河岳英灵集》录崔颢诗《结定襄狱效陶体》可知,其对陶渊明诗歌成就的接受观,既是其个性化审美观的体现,也是唐人的陶渊明接受观之反映。

四、《河岳英灵集》所见殷璠之陶渊明接受观再思考

据上文分析,《河岳英灵集》品评诗人虽未言及陶渊明,但据其选录诗什等,今人仍可管窥殷璠对陶渊明的接受,其没有否定陶渊明诗歌艺术,对陶渊明人格品行亦有推崇赞赏之意。那么,殷璠的陶渊明接受观,今人该如何认识评价?

《河岳英灵集》之《叙》曰:“夫文有神来、气来、情来,有雅体、野体、鄙体、俗体,编者能审鉴诸体,委详所来,方可定其优劣,论其取舍。至如曹、刘,诗多直语,少切对……自萧氏以还,尤增矫饰。武德初,微波尚在。贞观末,标格渐高。景云中颇通远调。开元十五年后,声律风骨始备矣。……璠不揆,窃尝好事,愿删略羣才,赞圣朝之美。”据此可见,殷璠《河岳英灵集》“审鉴诸体”,其裁鉴诗什主张“声律风骨”,这一点,学界多有论述。然,殷璠的选诗心态颇为复杂。此云“愿删略羣才,赞圣朝之美”,不能简单的理解为歌功颂德。据上文第二部分引述,殷璠援引唐前文士张衡、蔡邕、祢衡等评品唐人,其值得关注的是,殷璠对唐前文士贬多誉少。表面上看,殷璠

参考文献:

- [1]卢燕新,杨明刚.初唐编纂的诗歌总集考论[J].山西大学学报,2011(6).
- [2]遍照金刚.文镜秘府论汇校汇考[M].卢盛江,校考.北京:中华书局,2006:1536.
- [3]李珍华,傅璇琮.河岳英灵集研究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92:8.
- [4]郭绍虞.中国历代文论选[M]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79:300.
- [5]王维.王维集校注[M].陈铁民,校注.北京:中华书局,1997:70.

有颂赞古人意。然,其主旨在褒扬唐人。如评崔颢云:“可与鲍照、江淹并驱也。”评价王湾云:“非张蔡之未曾见也,觉颜谢之弥远乎。”等等。联系其《叙》谓“粤若王维、王昌龄、储光羲等二十四人,皆河岳英灵也”等观点可知,殷璠以盛唐人选盛唐诗,其心态之一即在于推崇盛唐诗人与诗文化,即“赞圣朝之美”。据此观之,殷璠评品诗人未及陶渊明,不能简单的理解为殷璠地接受观排斥或者漠视陶渊明。

唐人推崇陶渊明人品人格,据上文所引,旨早者可溯至初唐王绩时代。可见,陶渊明的人格魅力对唐人的影响源远流长。然,自昭明太子萧统《文选》始,诗歌选本及诗学理论家对陶渊明的评价没有达到相应的高度。有唐以还,虽然唐人编纂的诗歌选本如《古今类序诗苑》等佚逸,但据幸存序言及相关材料,与唐代文士相比,唐选诗理论家的陶渊明接受观显然未能有所超越。从这一点观看,殷璠《河岳英灵集》选录王维《偶然作》、崔颢《结定襄狱效陶体》,前者可视之为对陶渊明人行品格的接受,后者可视之为对陶渊明诗歌特色的认同。以此观之,自刘孝孙以还,殷璠对陶渊明的认识明显与文士诗人的接受观更为接近。

《河岳英灵集》选录崔颢《结定襄狱效陶体》,其意义值得深入思考。如前文,唐人喜爱陶渊明,更多的是效仿他的行为、嗜好、品格等。对陶渊明诗法的效仿,初盛唐显然不及中晚唐。宋胡仔《渔隐丛话前集》卷四引韩子苍语云:“予观古今诗人,惟韦苏州得其清闲,尚不得其枯淡。柳州独得之,但恨其少迨尔。柳州诗不多体,亦备众家。惟效陶诗是其性所好,独不可及也。”据《韦苏州集》卷一《与友生野饮效陶体》,今人可管窥其成就。唐人“效陶”用力至专,且成就突出者,实乃白居易。《白氏长庆集》卷五《效陶潜体诗十六首》,序云:“因咏陶渊明诗,适与意会,遂效其体成十六篇。醉中狂言,醒辄自哂然,知我者亦无隐焉。”白居易不仅效陶体为诗,亦效陶体为文。《旧唐书》卷一六六《白居易传》云:“其间又效陶潜《五柳先生传》,作《醉吟先生传》以自况。”据此观之,殷璠《河岳英灵集》选录崔颢诗,因唐人编纂诗歌选本佚逸甚多,很难确定其是否具有开先河之功,但其“删略羣才”的鉴裁之力却不得不令人惊叹。这也从一个方面看出,殷璠的陶渊明接受观与其他唐诗选本如《国秀集》《中兴间气集》《极玄集》等区别。

[责任编辑 海林]